

金融渗透与国家能力:北海银行的经验

魏 建

内容提要:国家能力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其中渗透能力十分关键,缺少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国家能力的其他方面就失去了根基。山东根据地北海银行的金融渗透过程提供了一个以渗透支持政权发展的典范。北海银行以稳定的币值先后战胜竞争货币,从辅币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法定币,同时通过贷款成功向社会基层扎根。辐射效应和扎根效应共同诠释了金融渗透的过程,也为理解国家能力的微观生成机制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充分说明只有与人民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渗透,才能成功将国家能力扎根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由此形成的国家能力才是强大和可持续的。

关键词:国家能力 金融渗透 北海银行 辐射效应 扎根效应

一、引言

在探索国家兴衰的过程中,国家能力理论成为一个解释力较强的理论。该理论经历了从“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的发展后更加成熟。^① 贝斯利和佩尔森(Besley and Persson)较早地把“国家能力”引入经济学,经济学界将国家能力指标化后进行实证分析,力求发现对国家兴衰具有重要影响的能力构成。^② 在国家能力的构成上,不少文献都强调了汲取能力,强调汲取水平是代表国家能力的关键性指标。^③ 然而,汲取只是一种结果,在国家能够汲取之前,需要具备众多的前提条件,渗透能力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前提。渗透能力不仅代表着国家被社会认可的水平,也对汲取能力与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且对政权的稳定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特别是“国家—社会”框架下的国家能力理论强调,如果国家不能渗透入社会之中,将导致失败的结果。^④

金融是重要的国家公器,货币更是政权的代表,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新生政权所发行的货币,从产生到其成功成为法定货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经历哪些历程?特别是,货币作为社会财富的代码,一个新货币的发行水平不仅代表着政权的渗透水平,更代表着该政权的汲取潜力,因此是一个观察国家能力形成过程的重要指标和重要窗口。但是从金融角度透视国家能力的研究并不多,现有的文献更多的是从比较或者宏观框架来讨论国家能力。米格代尔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讨论了第三世界国家能力有高有低的原因,认为缺少对社会有效控制是国家能力弱小的根源所在。^⑤ 有学者利用

[作者简介] 魏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山东大学中泰证券金融研究院特聘教授,济南,250001,邮箱 weijian@sdu.edu.cn。

① 李姿姿:《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学术界》2008年第1期。

② Besley Timothy and Torsten Persson,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Property Rights, Taxation, and Polit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9, No. 4 (2009), pp. 1218 - 1244.

③ 参见 Besley Timothy and Torsten Perss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 State Capacity, Peace, and Incom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 6, No. 1 (2014), pp. 927 - 949。该文对国家能力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和实证化进行了很好的综述。

④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188页。

⑤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273页。

神圣罗马帝国的史料充分说明了获取农业收成信息更容易的国家,享有更多的税收、更大的疆域和更长久的国祚,再次强调了信息收集能力对于国家能力的重要性。^① 贝斯利探讨了公民文化在扩大财政能力中的作用,他强调公民文化是基于具有公民意识和物质主义公民的相对回报而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公民文化表现为高税收收入,由高水平的自愿纳税和提供公共产品维持。^② 对于信息成本和文化的强调,更加丰富了对于国家能力形成影响因素的理解。刘长喜等通过对新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的分析,探讨了国家利用金融集权增强国家控制与动员资源能力的机制与途径,构建了一个金融化与国家能力的社会学分析框架。^③ 但总体而言关于国家能力形成过程中金融成长及其贡献的分析较少。本文将以北海银行的金融渗透过程为案例,说明金融渗透之于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④

北海银行成立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最后于1949年11月作为三个奠基行之一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的北海币是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流通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币值和信用最高的地方货币”。^⑤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经说,“抗战时,山东北海银行的钞票最硬”。^⑥ 北海币从当时国民政府法币的辅助币到新中国人民币的奠基币,经历了从不被信任到被信任、从小范围使用到山东根据地及其周围地区大范围使用的过程,最后为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北海银行的研究众多,主要是围绕着北海银行的成立、发展到并入中国人民银行的过程及其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作用进行研究,特别是其中的货币战过程,成果中陈新岗、陈强对北海银行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⑦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与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当时的账册、档案、报道、领导人讲话等为基础编纂的4册《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整理收录了研究北海银行最为权威的原始资料。但是尚没有从国家能力角度来审视北海银行发展历程的研究。那么,北海银行从一个新生银行到成为覆盖山东根据地的唯一法定银行,是如何成功实现金融渗透的?这个渗透过程对于国家能力的形成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北海银行的经验对于国家能力理论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二、金融渗透的困难:抗战初期的山东

金融渗透是指一个政权的金融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普及和被使用的水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该政权所发行的货币被认可与使用的程度。与政权渗透相比,金融渗透更加困难。通过武力可以将每一个层级的政权建立起来,但是对于金融来说,仅仅依靠暴力是不够的,因为金融渗透还需要经济力量,也需要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配合。经济力量要保障使用新货币和新金融机构的社会公众从中获利或者至少利益不受损,只有如此,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接受新货币、使用新货币,将新货币作为新的财富代表来对待,否则只能是在暴力强制下表面上的接受。然而,即使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都发挥作用,金融渗透也难以达到完美水平。当今即使是在金融最发达的现代西方国家,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依然是金融渗透的死角,更不用说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了。

① Huning Thilo R. and Fabian Wahl, “Lord of the Lemons: Origin and Dynamics of State Capacity,”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Working Paper*, 2017.

② Besley Timothy, “State Capacity, Reciprocity,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Econometrica*, Vol. 88, No. 4 (2020), pp. 1307 – 1335.

③ 刘长喜、桂勇、于沁:《金融化与国家能力——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5期。

④ 尽管当时革命根据地尚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国家,但其成长历程恰恰能为国家能力的生成提供很好的借鉴。因为国家能力的形成并不都是在国家正式成立后才形成的,其初始历程和能力积累往往是国家能力形成的关键密码。

⑤ 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页。

⑥ 薛暮桥:《薛暮桥同志谈如何发挥银行作用问题》,《上海金融研究》1980年第2期。

⑦ 参见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

(一) 金融渗透的政治困境

抗战前夕的山东是中国共产党影响薄弱的区域。出身于冯玉祥系的军阀韩复榘,1930年9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他主政山东七年多,先后三次破坏了中共山东省委,多次逮捕和成批地屠杀共产党人,导致中共山东省委被破坏停顿两年有余,中共山东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被中断,中央无法了解党组织在山东的活动情况。当时工农红军在南方创立过十多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革命根据地,山东却从没有建立起一支红军队伍和红色政权,更谈不上形成革命根据地。^①到1935年时山东省工委只有鲁西、胶东、苏鲁边3个特委和4个直属县委,处境十分艰难,影响力和民众的认同度都有限。1936年初,中共北方局派黎玉到山东恢复与重建山东省党组织,当时有联系的党员只有500人。^②黎玉经过艰苦努力于5月在济南召开山东省委重建后的第一次会议,开始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到1937年7月,下属有鲁西北、鲁西特委、胶东工委以及7个直属县委或工委,党员共有2000多名。^③

(二) 金融渗透的其他困境

抗战初期的山东,在战争的冲击下,社会动荡不堪。在战乱中,正规金融发展的困难更远高于和平时期,发行纸币和让百姓接受纸币的难度也大幅度提高。

1. 社会动荡导致的政治不信任。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以及后来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混战使山东饱受战乱之苦。韩复榘上任山东省主席后,山东省内依然有众多土匪横行,局面一直不是十分稳定。抗日战争初期,日寇主要战略方向是向南侵略,没有将在山东发展起来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作为主要对手。但1939年6月日军使用精锐部队发动了对山东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之后于1940年、1941年又多次发动规模越来越大的大扫荡,到1941年冬达到了高峰。日军的扫荡使抗日军民损失惨重,根据地范围缩小。并且,在山东抗战爆发后,韩复榘的逃跑使南京政府的政权体系在冲击下很快瓦解,各种武装力量纷纷自立,山东各地呈现出政治上的空白和混乱状态。

战争大大降低了百姓对货币(尤其是纸币)的信任程度。不论是军事力量占据上风的日伪军发行的纸币、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还是共产党发行的北海币,或其他武装力量发行的各种纸币,百姓在心理上都有所抵触。一是因为百姓拥有和接受这些纸币就意味着财富(尤其是粮食)的付出,但又无法确定这些纸币“今天拥有、明天能否可用”;二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有着使用白银的习惯,1933年南京政府才实施废两改元政策,广大百姓对纸币的接受性一直比较低。

2. 复杂的货币格局及机会主义发行更降低了可接受性。抗战前,山东的货币市场上流通着三种纸币。首先是南京政府规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法币,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流通量有4640万元,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韩复榘发行的两种纸币,一种是1931年设立的“山东平市官钱局”发行的铜元券,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实际流通429万元;另一种是山东民生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实际流通583万元。^④韩复榘弃鲁时将山东民生银行与平市官钱局带走,国民党中央银行则早在卢沟桥事变后便将山东中央银行法币大约7374万、现洋2458万运往大后方,^⑤这导致山东境内货币十分紧缺。

抗战爆发后,日伪军在山东强制推行伪币,主要包括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联银券、各种日本军票等。为掠夺物资“以战养战”,伪联银券发行数量巨大,仅1938年3—12月就发行了7.88亿元,此后更是疯狂增发。抗战胜利后仅在济南、青岛、烟台三地收兑的山东伪联银券存量高达

① 金冲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张新法:《中共和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④ 抗战前山东各种货币的流通数据,参见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108页。

⑤ 郭本意:《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地区国共铸币权之争》,《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357.2亿元之巨。^①各种日本军票更是专用的掠夺性票券。更让人深恶痛绝的是,日伪军为掠夺物资扰乱根据地金融,大肆制造法币、北海币等的假币。日军不仅成立了专门伪造法币的机构,而且在1942年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以及之后占领香港、南洋等地时获得了巨额法币与印制法币设备,于是日军就将真假法币一起向根据地和国统区输送。韩复榘逃跑后,遗留下来分散在山东各地的国民党大小的武装力量也纷纷发行了各种各样的纸币,用以获取财力,并且基本上都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发行策略,或者强迫或者欺骗百姓接受,一时间在山东百姓面前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货币,广大百姓饱受其苦。

面对杂乱的纸币,百姓从中甄别可用、真实货币的成本大幅度提高。持有和使用其中何种货币都要小心谨慎。其中有的货币币值极不稳定,特别是国民党投降派以各种欺诈性手段发行的“投钞”更是赤裸裸地掠夺物资财富的手段,一旦持有就是上当受骗。更有彼此对立货币的相互打击,日寇和国民党投降派都对北海币采取打击策略,对持有北海币的百姓,如发现就毒打,持有超过5元者就枪毙;抗日根据地则对伪币、杂钞也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所以一不小心不仅上当受骗,甚至有生命之忧,这样就导致百姓在接受任何纸币时都要倍加小心谨慎。

3. 高利贷的盛行。抗战前的中国,经济社会都处于困境之中,乡村社会更是处于持续的衰败与式微之中,绝大多数民众都挣扎在温饱线下。金融供给上,现代意义的银行只存在于城市之中,乡村地区基本上处于金融空白状态,只有传统的钱庄、典当等金融机构,且高利贷盛行。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发现,全国农户中负担佃租的农户占55%,而负担利息的农户高达62%。^②然而即使是高利贷也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农民对资金的需求呈强烈刚性,也没有其他的可替代方案,农民借债主要用于解燃眉之急的生活消费。社会学家潘光旦说:“除了马上自杀,完全不做苟延生命的打算,农民在借债和不借债之间,是丝毫没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的”。^③高利贷盛行,一方面说明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这为今后北海银行等的发展预留了潜在空间,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正规金融的成长和渗透面临困难,尤其是乡村对于银行等现代金融的认知和接受水平比较有限,高利贷占领农村金融市场,正规金融要下沉发展就需要找到正确的路线。

共产党对山东影响力薄弱,以及战乱与高利贷猖獗,这些都导致了百姓接受北海币的困难。那么,北海银行是如何在纷乱中成长起来的、北海币是如何广为百姓接受成为“硬通货”的呢?

三、在竞争中渗透:北海币的奋斗

北海银行诞生于战乱之中,北海币在炮火中发行,在与其他货币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将杂钞、法币、伪币一一击败,获得百姓的信任,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法定币。

(一)1942年及以前的北海银行

1. 北海银行的建立和复建。1937年10月,共产党组织领导了掖县(现为莱州)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3月占领掖县县城,先后成立了掖县民主政府和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8年4月为解决抗日政权资金短缺、区内货币流通混乱的问题,抗日政府开始筹办银行。特别是在占领掖县县城时意外获得了1千余两黄金,这为北海银行的成立提供了支持。^④8月份开始投放面值为一角、贰角、五角、壹元的北海银行券(北海币)。12月北海银行正式成立。但1939年1月,日军逼近掖县县城,

^① 参见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110页。

^② 转引自李受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乡村社会运行系统的重构及其启示》,《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③ 转引自李金铮:《内生与延续:近代中国乡村高利贷习俗的重新解读》,《学海》2005年第5期。

^④ 不过撤离掖县后,当时的经理张玉田将北海银行1000余两黄金、印刷票版、账册等带至国民党赵保原处。胶东区当时主持北海银行恢复工作的陈文其只从张玉田处要回账册、票版和一部分准备金,没有要回黄金。参见郭本意:《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地区国共铸币权之争》,《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北海银行被迫转移,暂时停办。

1939年8月,在中共胶东区财委会的领导下,北海银行在胶东莱阳重新建立,依然是发行壹元及以下的小额纸币。重建后的北海银行,发展十分迅速,胶东根据地各区先后都成立了支行。支行在各县建立办事处,办事处在各个乡区设立贷款员,贷款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农村开展业务。

1940年10月,鉴于北海银行的成功,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把北海银行升级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银行,并在鲁中根据地成立北海银行总行,胶东原北海银行改为胶东分行。此前在1940年6月已经成立了清河分行,1942年先后成立了滨海分行、鲁南分行。北海币的流通范围向全省扩展,发行量也开始放大,1938年开办到暂停时仅仅发行了9.5万元,1940年为790.5万元,1941年为1455.8万元,1942年为4794.5万元。^①

2. 在复杂的货币格局中进行抗争,逐渐扩大发行规模。北海币诞生在战乱中,此时日寇已经大肆推行以伪联银券为代表的伪币,对法币在表面上打击,但实际上允许流通(因为日寇要收集法币以换取美元、英镑等外汇),但对于北海币则是严厉打击。更为复杂的是,国民党残留的各种武装以及一些地方商绅等纷纷推出各种杂钞,这其中又分为国民党投降派推出的“投钞”和地方商绅推出的“土钞”。面对复杂的货币局面,抗日根据地严厉打击伪钞、投钞,维护法币,对于土钞则采取了收兑禁止继续流通的措施。区别对待的政策,特别是严厉打击伪钞,压缩伪钞的使用范围,对抗伪钞的经济侵略,既展现出了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决心,也保护了抗日军民根本利益。

更重要的是,根据地积极推行北海币。1941年北海银行总行发布《推行新钞宣传大纲》,提倡山东各界军民应兑换和使用新钞。时任北海银行行长的洒海秋在《大众日报》刊文号召推动北海币的行使,指出通过召集各方面代表会议、组织新钞推行队、拜访商户等方式,宣传“北海银行是有基金有组织的银行,它不但以整个抗日政权的收益做保证,并且存有大量的基金,随时随地都可以兑换法币”,“如持北海钞票买卖,则概以九五折计算”。同时,积极鼓励设立主要使用北海币进行交易的小集,“以分散设立小集对付敌之并集和打集……每相距十里以内遍设小集,群众不用远道赶集,节省时间、半日即散,不易受敌摧残,即遭打击损失亦有限,且易逃散”。通过有组织的宣传和推行,北海币的影响日趋扩大。^②

3. 站稳脚跟,获取百姓的信任。在分类对待法币、伪币的同时,除去通过贷款等方式发行北海币之外,抗日根据地还采取了众多措施来获得百姓的认可和支撑以站稳脚跟。

首先,以辅币身份出现,承认法币的主导地位。北海币出现之初即是作为法币的辅币来定位的,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行壹元及其以下面值的小额钞票。1940年5月13日的《大众日报》就报道说“北海银行为我山东抗战军民自营之银行……顷为维护法币……粉碎敌寇‘以战养战’之经济侵略阴谋……特发行该行壹角、贰角、伍角辅币三种,凑足十角即可兑换法币壹元”。这既是抗日统一战线要求,也是因为“法币无论在我行政区或敌占区,信用比任何货币都高,因为它有很长的流通历史、全民族的保障、国际信誉”。维护在百姓心目中正统货币——法币的地位,将自己定位于辅币,使北海币不完全以新货币的形象出现,大大提高了其可接受度。^③

其次,在开办过程中发挥专家作用,且由公私合营转为公营以强化货币信用。1938年攻克掖县县城后,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的郑耀南队长得知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从青岛避难来到掖县县城,就出面邀请张玉田帮助筹办北海银行。张玉田通过私人关系从青岛解决了票版和印制工人等

① 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72页。

② 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129页;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207、216页。

③ 在胶东区自1939年就有壹元北海币发行,1941年北海银行开始发行伍元币。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62、210页。

问题,并招募了一批具有银行工作经验的员工一起开办银行。专业人士的加入,使北海银行从诞生之日起在运营和管理上就比较规范。

北海银行在创办之初采取的是当时创办银行较为通用的模式——公私合营。计划是由抗日支队司令部和掖县、黄县、蓬莱三县的经济委员会共同出资 25 万元。但实收资本只有掖县、黄县出资 10 万元多,一部分由工商界认购、一部分通过层层派购完成。1940 年成立的北海银行清河支行在开办之初也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有助于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初创的银行打开局面。后来,北海银行和清河支行都改为公营,将原先的民间出资赎回,成为抗日根据地的主办银行,进一步提高了北海银行的信誉度和号召力。

第三,承认与接受百姓的使用。胶东区的领导回忆到“政权撤出县城后,群众不知北海币还用不用,心情恐慌,我们收税,群众就拿它交税,我们要不要呢?经研究不要不行,我们不要等于不要群众……因此区党委决定北海币继续行使,交税照收,群众情绪逐渐稳定,不着急花了”。北海币从诞生到转化为人民币,中间只有在掖县诞生后到胶东重建这一段时间有所中断,但即使这个过程中,北海币也没有中断被使用,在当初发行地黄县(今龙口)、蓬莱、掖县,老百姓依然使用北海币。因此,当百姓使用北海币向抗日根据地政权交税时,尽管根据地政权的驻地改变了,但依然承认和接受北海币,并且抗日根据地的机关、军民带头使用北海币,这就让百姓对抗日根据地有了更多的信任和信心,从而将北海币顺利延续了下来。这个举措也让抗日根据地与那些打着抗日旗号只管发钞抢夺财富的国民党顽固派显著地区分开了,百姓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抗日根据地是真心抗日、确实为百姓利益奋斗的政府,是与旧政权完全不同的政权。^①

(二)1942 年到 1946 年前的北海银行

1. 排挤法币的根本原因。法币是南京政府的法定货币,在抗日统一战线下,抗日根据地应当维护和使用法币。但是形势的变化使法币成为日寇掠夺根据地物资财富的工具。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在 1942 年初占领了上海租界,国民政府在上海租界的外汇市场因此关闭。这样日寇就无法使用法币换取美元、英镑进而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需物资。日寇从此改变了对待法币的策略,将其在上海、天津等地抢获的 70 多亿元法币向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倾销以掠夺各种物资。后来,日军又在香港、南洋等地截获大量法币和印制法币的设备,利用这些设备伪造了大量法币。同时,国民党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从 1942 年开始加速扩大发行法币。这样,法币不仅成为日寇掠夺根据地物资的“黑手”,而且随着大量法币的挤入,导致根据地的物价不断上涨。如不斩断这个黑手,根据地百姓的财富加速流失将陷入经济危机。因此,开展货币斗争,将法币排除出去以北海币代之,不仅是抗日的需要,更是保护百姓利益的需要。

2. 第一次货币斗争。1942 年 5 月,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发布《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折价兑换法币,将北海币确定为本位币,开始展开对敌金融斗争。7 月山东战工会又召开扩大金融会议,部署进行货币战。

实际上在此前,货币战就已经率先在胶东区展开。从 1942 年初,日寇就开始向胶东倾销法币,造成胶东区物价飞涨。面对日寇的法币倾销,胶东区开始停收大额法币,然后要求八折使用法币。1942 年 9 月,要求东海、北海两区停止一切法币流通。1943 年 4 月,要求西海区也停收,南海区实施二折。1943 年年底,胶东区排挤法币的斗争基本上取得了成功。胶东区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胶东区当时属于较为富裕的区域,日寇将其作为法币倾销的重点区域大肆掠夺,“敌曾以轮船载入大批法币,到荣成各市镇和文登东部地区,用购货方式进行推销。五垒岛是个很小的镇口,在七、八、九月份内,由南船带进的法币达数百万”,“敌一次在石岛船上卸下一百万法币”。这就导致

^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 1 册,第 29—31、33 页。

胶东区法币不断跌价、物价飞涨,特别是其中真假法币混杂,根据地和百姓损失惨重。并且北海币在胶东区发行和流通时间相对较长,信用卓著。因此,在发现打折使用无法遏制损失时,就毅然决定停用法币,百姓也欣然接受停用,这才从根本上切断了法币与根据地的联系。^①

但是,其他根据地却没有取得成功。滨海区是当时山东战工会所在地,部署从1942年8月1日起以北海币为本位币,自8月15日起对法币五折使用、五百元以上的法币不得进入根据地,但是法令发布后,效果不佳。百姓对“鬼子打击法币,八路也打击法币”不理解,宣传发动不到位,百姓兑换也不方便,甚至军政机关依然在使用法币。到12月,滨海区只得再次部署,但依然没有下定决心停用法币。清河区自1942年10月发布法令宣布北海币为本位币,对法币八折兑换(1943年2月15日起五折)也都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并且清河区还遭到了日伪使用假北海币的大倾销。^②鲁中区的情况也基本上相同。直到1943年上半年这种情况也没有显著改善,根据地物资在不断流出,1943年的法币物价比1942年上升了5倍,^③局势在持续恶化。

3. 第二次货币斗争。为扭转局面,共产党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再次部署,展开了第二次货币战。这次不仅部署全面,而且有了专业的领导者——薛暮桥。1943年2月,经济学家薛暮桥来到山东,在山东领导的要求下留在山东工作。薛暮桥等通过调研分析后提出了坚决停用法币等系列对策主张。

1943年6月20日滨海专署发布停用法币的布告,主要要求:一是自7月21日起,法币停止在市面上流通;二是两期兑换,自7月21日到31日法币一元兑换本币一元,8月1日到8月10日法币两元兑换本币一元,自8月11日起查出使用法币的概予没收;三是对外贸易使用法币要提供证明,去银行兑换;四是广泛设立临时兑换所;五是加强稽查封锁,并给予查获者奖励;六是各级政府成立停用法币委员会,各级主要领导负责,村由村政委员会负责,进行广泛深入的发动、宣传,组织各界讨论为何和如何停用法币。^④随后,鲁中区于1943年8月、清河区于1943年9月也进行相同的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停用法币运动。

由于举措得力、部署周密,辅以良好的外部环境,^⑤第二次排挤法币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效。1943年8月13日的《大众日报》刊登“滨海货币斗争已获初步胜利”的报道,并发表社论“贯彻货币斗争,巩固已得胜利”。薛暮桥则说早在1944年2月份,山东各个根据地基本上完成了停用和法币贬值任务,取得了消除通货膨胀降低物价、提高北海币币值、防止物资流出的同时换回物资掌握对外贸易主动权的业绩。6月黎玉也总结到:“如果我们继续保存法币伪钞,便将在不知不觉中损失五亿四千万,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字……这样一进一出,我们所保卫和换回的物资当在十亿元以上,这对根据地军民也是一个巨大的功绩”。^⑥

随后,在北海币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本位币后,建立全省统一的北海币市场提上了日程。北海币分区发行和流通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44年春、夏,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反攻,成功地将滨海、鲁中、鲁南根据地连接在一起,8月在这三个区试验北海币的统一发行和流通取得了成功。1944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下达《关于货币政策的决定》,又将胶东区和渤海区的货币统一提上日程,

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251、253页。

② 为防止敌人使用不同根据地分区发行的北海币在根据地之间套利,同时加大敌人伪造北海币的难度,山东战工会要求各个根据地仅仅使用自身发行的北海币。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314页。

③ 参见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130页的图4-3。

④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302—303页。

⑤ 1943年夏国民党主力部队撤离山东,法币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依托。

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315—322、352—353页。

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北海币成功实现了全区统一流通。日寇投降后,此时已经成立的山东省政府8月29日再次布告《决定北海银行本币在全省统一流通》。至此,北海币完成了从小小的区域辅币成为山东根据地全省流通本位币的进程,到1945年底山东省108县中共占领94个,北海币基本上统一了山东市场,该年已经累计发行20.88927亿元,详见表1。1945年10月国民党军队重新进入山东,却发现法币在山东境内已经无法购买物资补充给养,镇守济南的李延年只好请求南京财政部调拨北海币以购买物资。^①

(三) 货币斗争与金融渗透

1. 利益兼容。经过货币斗争与全省统一流通,北海币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使用和流通的唯一货币。这个过程的顺利完成,并不是单纯依靠政治力量的强制和动员,而是因为其符合与保护了根据地全体军民的利益。

在货币斗争之前,北海币只是在根据地流通的若干货币之中的一种,尤其是在抗日统一战线下要保护和维护法币,北海币定位为法币的辅币,因此其发行与流通占比相对都不高。例如,1942年9月前在胶北海区,北海币在总流通量中只占15.56%,而法币占32.88%、伪币占36.08%。即使在货币斗争中的1942年下半年北海区北海币的占比才提高到了40.8%,法币下降到了16.7%,伪币占39%。也就是说,在货币斗争前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抗日根据地内都是多货币格局。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法币不仅在不断贬值,而且成为物资掠夺的工具,伪币更是属于被打击的对象且日渐贬值。因此,抗日军民如果继续持有这些货币,就会不可避免地不知不觉中遭受巨大损失。如前黎玉所述,如果不将法币排除出去,根据地直接遭受五亿四千万的损失,这对于经济本来就孱弱的山东军民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因此,一旦当百姓明白排挤法币是有利于己的道理,就会积极支持。特别是对比之下,接受和使用北海币的益处更是直接地为百姓所感受,一方面是北海币的币值在上升,根据地的物价在平稳下降;另一方面是伪币、法币不断贬值和物价飞涨。所以,百姓说:“只有北海票最牢靠,汉奸票靠不住,中央票因为日本人捣鬼也不保险了”。^②

这样,北海币在与法币、伪币等的斗争中成功地渗透到了根据地全体军民手中,从多种货币格局下的辅币成为根据地内全流通的、独占市场的法定币,成为根据地百姓手中财富的代表者,不仅使百姓财富不被侵蚀,也使百姓再次更加直观、深刻地认识到了共产党政权的本质,完成了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完美配合。

2. 稳定币值是北海币渗透成功的关键。那么,为什么“北海币最牢靠”呢?北海币是纸币且没有类似于法币那样有英镑、美元做后盾,也没有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做支撑,其稳定的币值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政权的不断胜利是政权所发行货币的第一保障。如果政权摇摇欲坠,其货币也就不被信任和使用。薛暮桥说:“过去的经验证明,今天我们货币的主要保证:首先是政权(如打胜仗或败仗),抗日战争的后几年,伪钞猛跌,而我本币始终稳定,其主要原因亦即在此。”^③从表1也可以看出,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北海币的发行量也在不断扩大。其中,1943年根据地的村庄、人口、面积都比1942年翻了一倍,北海币的发行量也差不多增长了近一倍。1944年到1945年更是根据地大反攻的两年,发行量也同步大增。

① 郭本意:《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地区国共铸币权之争》,《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259、264、348—349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419页。

表1 北海币发行量与山东根据地发展的关系

年份	发行量(千元)	累计发行量(千元)	村庄占比(%)	人口占比(%)	面积占比(%)
1939	324	324	—	—	—
1940	7905	8229	—	—	—
1941	14558	22788	—	—	—
1942	47945	70733	15	13	14
1943	79847	150580	36	37	31
1944	387636	538216	48	52	56
1945	1550711	2088927	68	66	68
1946	13629091	15718018	94	90	92
1947	69562747	85280765	—	—	—
1948	521896270	607177035	—	—	—
1949	182068400	789245435	—	—	—

资料来源:发行量数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4册第565页相关内容整理;山东根据地占比数据引自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194页相关内容,其中1946年的数据是1946年3月的数据。

其次,北海银行从成立之初就秉持了谨慎发行的原则。北海银行1938年在掖县开办时筹集了10万多元资本金,但只发行了9.5万元北海币。在胶东重建后,就强调“北海银行是有基金有组织的银行,它不但以整个抗日政权的收益做保证,并且存有大量的基金”。北海银行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艾楚南就对纸币的发行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1940年他就强调“发行统一的货币,额数不得过多或过少,以商品流通情况为转移”,1941年他又指出“纸币的发行必须不超过纸币所代表着的金或银……如果纸币的发行超过了这个量时,那么币价就要以同样的比率降落”,因此要稳定币值、安定物价就不能滥发纸币。同年山东分局也明确要求“把印发纸币的权力,完全交于银行,非经银行许可,任何地方政权不得随便发行纸币或流通券……立刻停止以发行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的‘挖肉补疮’‘坐吃山空’的办法”。当时根据地对于纸币发行量有着一个经验性的判断,即发行量以根据地每人30元为标准。超过这个标准就可能导致贬值,低于这个标准将导致升值但物价上涨。实际上在早期受制于印钞装备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短缺,北海币基本上都处于发行不足的状态。

第三,在货币斗争中更加明确了货币政策的基调:保持币值、稳定物价。在1943年9月货币斗争之初,作为货币斗争的操盘手,薛暮桥就发文全面阐述了纸币发行规律与开展货币斗争的策略,他指出纸币的发行数量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要符合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需要,这首先与根据地扩大与缩小有关系,其次与抗日政权的财政收支平衡有关系;二是要符合与外汇保持一定比率的需要,并强调违反市场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违反群众本身的利益,就会遭受损失,更不会得到群众的支持。经过货币斗争并取得胜利后,薛暮桥1945年总结指出:“我们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保持币值,稳定物价”,“我们的本币是与物价联系,是把物价指数作为我们决定币值高低的标准”。不是单纯地进行货币斗争,而是争夺货币主导权和战略物资掌控权。他说“货币的最基本的保证是物资,谁掌握了物资,谁就掌握了货币斗争的主要武器。所以我们的货币政策应当是:货币发行一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增殖物资,充实货币基础。另一部分用于掌握重要物资,来作为本币的准备基金,此项准备基金应占发行量的半数”。在这样的货币政策下,货币发行量完全向市场流通中物资看齐,基本上消除了超发与少发的可能。再后来,薛暮桥将这个做法总结为货币的“物资本位”,并提出了币值稳定的纸币会自动驱逐币值不断贬值纸币的“良币驱逐劣币”理论。^①

^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207、368、389、392、407、411页;陈新岗、陈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第122、125页。

四、贷款支持经济发展:向基层渗透扎根

如果说货币战使北海币在覆盖面上取得了胜利,成功获得了根据地全体军民的信任,那么北海银行的贷款业务则是使北海币更深地渗透到百姓中、扎根于基层中,更加凸显了“救民于水火”的功能,从而更为百姓所拥戴。

北海币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入流通:一是作为工商资金,由政府设立的贸易机构掌握,用以买入卖出物资,掌控外汇平抑物价。薛暮桥指出“在山东的规定是:发行货币最少应以一半作为工商资金”。^①二是进行贷款支持生产。在北海银行成立之初就发放贷款1万余元,随后作为根据地军民自己的银行,北海银行主要面向农村和军民生产进行贷款。

(一) 贷款的发展历程

在贷款的组织上,抗日根据地政权将贷款发展生产、扶助贫苦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责。早期抗日政府主要是通过成立贷款所的方式举办低利借贷,如莱芜县、泰山区、北海区、鲁南区都设立了贷款所,主要将贷款发放给贫苦农民和抗属进行农业生产。1942年后,随着北海银行覆盖了各个根据地,北海银行参与到贷款中。各地贷款所先是在农救会的领导下,后来归属于北海银行。^②北海银行领导贷款所主要负责款项的发放、回收及相应手续的办理。政府依然是贷款的主要责任主体,政府确定年度贷款总额、利率与各层级分配额度,由村政委员会民主讨论确定贷款对象、监督贷款的使用、督促按时归还贷款。贷款对象以贫苦农民、抗属为主,特别强调贷款是扶助生产,不是救济。贷款利率强调低利,明显区别于高利贷。

在投向上,每年的春耕贷款是重头戏,在贷款中占比也最高。政府精心进行组织,要求各级成立春耕委员会,北海银行更是全程负责办理贷款手续。其中有两项特色贷款更是深受百姓爱戴。一是纺织贷款。自1942年起北海银行就在抗日根据地政府的要求下发放专项贷款大力支持纺织业的发展。贷款采取多种方式,可以是针对购买纺织机进行贷款,也可以是对纺织合作社、纺织小组、纺织户进行贷款,可以是直接发放北海币,也可以是购买纺织机或者棉花后进行实物放贷。在贷款支持下,全省各个根据地掀起了纺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时,根据地基本上实现了土布的自给自足,还有所出口。不仅抵制了洋布的倾销,而且改善了纺织户的生活,有效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③二是山东具有漫长的海岸线,鱼盐产出丰富,特别是盐一直是根据地向外输出换取收入的重要物资,因此特别发展了面向渔民、盐民的贷款。尤其是针对渔民的贷款,有效地将渔民从渔行近乎高利贷的盘剥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贫困渔民生产的积极性,改善了贫困渔民的生活,得到了渔民的积极拥护。

(二) 基于低利贷款的渗透

贷款是银行最基本的业务,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作为具有跨时期性质的贷款业务,在开展过程中面临着比和平时期更多的变数,但同时社会也有着比和平时期更强烈的借款需求。北海银行在根据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展贷款业务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责任与担当,这种担当为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特别是来自基层的支持与拥护。

1. 政府主导低利贷款。贷款是政府的一种行为,是帮助恢复被战争摧残的生产生活进而支持抗战的需要。贷款基本上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完成,不仅是政府金融政策的体现,而且每个环节都依靠政府力量,银行仅仅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参与其中,没有独立性。贷款成功的保障,包括发放、回

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419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438页。

③ 杨焕鹏:《微观视野中的胶东抗日根据地研究》,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第375—376页。

收,也是依靠政府及其支持下的力量。胶东区是贷款业务发展最好的根据地,1944年发放春耕农贷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应加强组织与领导这一工作,切实负责,反对将贷款工作视作是银行的事,不讨论不掌握的错误观念,在发放贷款的期间,县政府的农林科、农救会与银行及区公所、区农救会,应共同组成贷款工作组”,深入基层发动贷款并确保贷款投入到春耕生产中去。这样,接受贷款支持并因此获益的百姓,也都将贷款看作是政权行为,贷款覆盖的范围越广,则对抗日政权的认同度越高,因此对抗日政权的接受度也越高。实际上,抗日政权也清醒的认识到贷款具有重要作用,在1944年检讨工作时就指出“在地区上,过去局限在中心地区,忽视了边缘区,今年要配合对敌政治攻势,在边缘区多贷一些,注意发放贷款与政治教育密切配合,提高群众觉悟”。并且当贷款群众“因受敌投之烧杀或其他天灾而不能按期偿还本息者……酌量准其转期并停止计息”。1944年秋胶东旱灾,北海银行胶东分行决定对“旱灾严重地区,一般停收,由群众自由还款”。入冬后为了解决农民的困难,胶东分行再次决定“缓期收回未收回的放款,也不收过期利息”。^①

2. 民主确定贷款对象。贷款业务毕竟属于金融业务,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抗日根据地政权经过一番探索后,逐渐确定了适合战争与农村环境的贷款发放方式。基本的模式是:贷款工作小组“召开村民大会宣传解释贷款的意义与对象用途,使群众真正了解贷款是扶助有生产力而无生产资本的;公民小组讨论登记并评议谁应贷谁不应贷;再经村政委员会评议,配合村、区干部、贷款员讨论核批,贷款员再挨户审查贷款及办理手续”。“采用民主方式批款,群众、干部都很满意,群众反映民主啦,贷款也咱说算;村干部则说咱也不背黑锅”。村内百姓对于相互之间的生产能力有着充分的信息,民主决定贷款对象就能够将具备生产能力和意愿但缺少生产资料的贫雇农筛选出来,也能将游手好闲的人排除在外,从而从根本上确保贷款确实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与赌博,从根源上确保了贷款的安全。民主决策也使更多的村民了解了贷款的本质,扩大了抗日政权的渗透与影响,也促使其为获得贷款改善家庭状况而主动提高生产积极性,主动向合作社、变工组等靠拢,村庄的生产能力与抗日政权的号召力都显著同步提升。并且同样采取民主方式检查贷款的使用情况,“检查中发现用途不当的均加以处理,处理方式是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征求群众意见,有的追回,有的保证今后不再赌钱等”。民主决定贷款的发放与回收,是战时确保贷款安全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是共产党群众路线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将贷款标准“具有生产能力却缺少生产资本”明示给全体村民,对于村内每个个体的生产能力具有较为充分信息的村民们,在村干部的领导下,完全能够将那些符合标准的人筛选出来。一方面,如果选择不公平不真实就会遭到村民的质疑和挑战,另一方面村干部也具有监督与纠错作用。当贷款不被正确使用时,同样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监督,不仅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不当使用,而且能使借款人声誉受损。可以说,民主方式完全符合了传统“熟人社会”的特征,也符合战时要求。^②

3. 深入基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同提高。如前所述,在当时的农村除了有高利贷存在以外,基本上属于金融服务的空白区域。“穷小子是取不到半文钱的,即便是能够东借西借的取得几文钱,也是受到高利贷的重利盘剥的”,北海银行的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当时农村金融的空白,符合社会需要。更重要的是,北海银行是人民的银行,是服务于抗战需要的银行。在贷款对象的选择上,自然将贫雇农与抗属作为了优选对象,贫雇农处于农村社会的最底层,这样贷款就直接进入到了社会的最基层,这个深度可能是以前所有正规金融业务从未涉足的领域,并且在广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胶东分行东海支行报告1943年的春耕贷款中发放给贫雇农的占比达到80.94%,抗属占比8.1%。

^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442、462、464、478—479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457、476—477页。

北海支行报告 1943 年下半年低利贷款中贫雇农占比 81.58%。胶东分行 1944 年报告春耕贷款贫雇农贷款额占比为 87.4%，抗属占比 19.21%。贷款显著改善了贫雇农的生活，促进了生产。“农民经过贷款生产后，生活改善了。据统计，一般情形贷款一元，可赚三元。”

同时，在贷款对象中，特别注意了那些具有战略物资生产能力却没有生产资本的群体，如前所述，渔民、盐民、妇女等成为重要的贷款对象。鱼盐能够为根据地换取外汇，妇女能够进行纺织生产，而这些群体也基本上都是被金融服务排除在外的社会底层群体。渔民受渔行盘剥，“过去渔民捕鱼无船无网，必须投渔行借船网，捕得的鱼都交渔行，待渔市完毕才酌给渔民几元钱……而且每年总有批弄不到船网的渔民失业”。盐民更是缺少开垦盐田的资本，不少盐民处于失业状态。妇女本来的社会地位就低，更缺乏话语权。然而，在贷款支持之下相应的生产能力被激发出来，不仅这些群体生活显著改善，而且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东海支行 1944 年报告说“平均每个渔民可收入五千四百多元，约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收入改善最为显著、覆盖面最大的是纺织妇女。1942 年 12 月 21 日《大众日报》以《滨海生产成绩大，明年单衣不用洋布》对纺织业在贷款支持下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妇女纺织显著改善生活的情况进行了报道。^①

贷款深入基层，既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更是对抗日与共产党政策的宣传。贷款成为政权深入基层的桥梁，也成为体现共产党政权与其他政权显著不同的一个重要载体。民主决定贷款的过程使基层农民了解了贷款标准，使农民认识到只要勤奋生产都可以得到贷款、改善生活。借助于贷款成功改善生活的例子在乡村间口口相传，带动了更多农民的参与、效仿，特别是一直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的妇女们，靠纺织就能使收入大增、使自身的社会地位大为改善。这就为抗日根据地的全体百姓树立了榜样，更看到了跟着共产党过上好日子的希望。自然而然，对共产党的认同感、信任感和支持度都大幅度上升，共产党成功扎根在了百姓中。

五、金融渗透与国家能力:进一步的讨论

(一) 金融渗透的两个效应

在战争中诞生的北海银行，显然不同于和平时期的银行，北海银行的成长体现着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成就，体现着共产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当时经济体系的改造。这种改造或者说渗透是成功的，可以总结为两个效应。

1. 辐射效应。币值稳定的北海币成功地由小区域的辅币不断辐射、壮大，成为整个山东根据地的法定币。抗日政权的不断胜利是其背后的核心支持，北海币以币值稳定为核心原则也是其重要的保障。因为同时期不同的抗日根据地也分别建立了银行发行了货币，但或者失败退出，或者币值不够稳定，没有取得北海币这样的成果。稳定的币值使北海币乐于为百姓接受，百姓自觉接受北海币也表明抗日政权被百姓所认可，北海币成为抗日政权向百姓辐射其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把北海币看作是抗日政权影响力的代表性指标。

我们将北海币以稳定币值不断扩大覆盖范围进行渗透的过程，称之为北海币的“辐射效应”。通过辐射，北海币成功取代法币、伪币、杂钞，成为百姓手中财富的代表，成为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重要的“经济公共物品”。特别是借助于物资渠道进行货币辐射，是北海银行的一个重要创举。在薛暮桥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前，北海银行就注意在春天投放物资收回货币，秋天收购物资放出货币，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化解每年春天根据地百姓青黄不接的生活困难。薛暮桥主持工作后更加突出强调物资的作用，将每年北海币发行量的至少一半用于物资的掌控，“山东的规定是：发行货币最少应以一

^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 1 册，第 440、446、454、459、469、470、472、474、512 页。

半作为工商资金”。^①一方面是用物资调节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和物价,当物资不足(如春季)或者物价上涨时就抛出物资、收回货币,反过来当物资供应过多(如秋季)或者物价下跌过度时就收购物资、抛出货币。另一方面是用物资调节外汇,防止根据地出现内外收支不平衡,保护北海币币值的稳定。战争时期,不论是外汇还是黄金都没有物资重要。不论是百姓的生存,还是根据地的战斗,都需要以物资为后盾,所以将物资作为北海币本位和后盾就抓住了关键所在,根据地百姓在接受物资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北海币。即使是敌人要获得山东根据地产出的食盐、花生等物资,也必须用根据地所需的物资来交换。由此,以物资为本位,不仅为北海币币值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北海币的广泛流通使用提供了百姓乐于接受的渠道,从而加速了根据地军民法定币的转换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货币信任的转换过程,因为纸币完全靠发行者的信誉来维持。由此,抗日政权的国家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货币主权得以建立。显然,与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货币相比(比如金银),一个政权发行的货币成为全社会的法定货币后,该政权以此货币为基础进行战争和建设的潜力、途径、手段就开阔了很多。

2. 扎根效应。北海银行通过贷款的方式展开了另一种形式的渗透,完成了更深层的扎根。这种扎根,一是体现在贷款对象基本为社会最底层群体上,如前所述,贫雇农占春耕贷款的80%左右,社会底层的渔民、盐民、妇女也成为贷款扶助的主要对象。借助贷款支持,身在社会底层的这些群体,不仅因为靠自己的努力生产获得了不菲收入,改善了自身以及家庭的生活,而且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上升。由贷款支持带来底层群体的双重改变,使这些群体对北海银行及其背后的抗日政权,既认同又感激,拥护与支持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二是体现在通过贷款对旧有社会结构的改造上。贷款对象的确定采取民主评议的方式,民主评议的制度安排明显不同于传统乡村士绅主导的安排。在贷款获得过程中,那些参与了合作社、变工组、农救会的贫雇农,特别是抗属,获得贷款的机会显著高于不向共产党组织靠拢的群众,这样就带动群众向党组织靠拢。特别是妇女加入各种纺织组织,使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来自家庭的封建束缚,甚至成为新女性,送夫、送子参军的例子不胜枚举,更涌现出众多女劳动模范。三是基于贷款对传统的生产组织进行了改造。例如,对原来具有严重剥削性质的渔行,胶东根据地要求其实行四六分红(渔行六、渔民四),生产超过万元以上给予奖励,同时废除旧渔行的其他盘剥手段。只有符合要求后,北海银行才给予渔行贷款,促进渔业生产。

与辐射效应相比,扎根效应的渗透更深入,对既有社会结构的嵌入程度更深,因而形成的动员能力更加强大。扎根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低利贷款有效改善了生活,为贫苦的借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以及基于经济利益而产生的社会地位的上升。经济利益的赋予成为共产党抗日政权利用、改造传统社会结构,并进而发展出有利于国家能力累积与壮大的新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因此,能否扎根、能否形成扎根的兼容机制,也成为国家能力质量高低、可持续性强弱的关键所在,从而扎根效应是否存在也就成为判断与观察国家能力能否突破“国家—社会”矛盾的核心指标。

(二)影响金融渗透的要素

在北海银行的成长历程中,辐射效应使北海币在横向上逐渐覆盖了山东,扎根效应则使其在纵向上深入社会基层。在这个过程中以物资为后盾进行辐射和对贫雇农贷款进行扎根是渗透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审思这个渗透过程,主要有两个因素深刻影响了渗透过程。

1. 与政权力量的契合。政权的存在和壮大是所有国家能力提升的前提,反过来也是国家能力追求的结果。将政权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进而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是所有政权追求的目标,但是并不是所有政权都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政权力量实际上包含着很多方面的内容,但人们往往只强调了其中的政治力量,而北海币的渗透过程凸显了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契合推进更

^①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3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202页。

为重要。

薛暮桥强调“货币斗争的胜利,首先建筑在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结合上”。他说“所谓政治力量,是用法令来限制或者规定某些经济活动”,“所谓经济力量,即掌握货币或物资,通过市场的自然规律去左右市场和人民的经济活动”,“把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适当结合起来,则能发挥更巨大的斗争力量”,“有了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还要善于运用。所谓善于运用就是要能善于掌握规律,并有统一领导”。他指出首先运用政治力量进行宣传,将军民动员起来形成停用法币的秩序,然后依靠经济力量将政治动员形成的秩序稳定下来、持续下来。“我们的经济斗争主要依靠经济的力量,政治力量仅在不得已时才适当采用”,因为经济力量顺应市场自然规律,并不需要强制,比政治力量具有持续性。^①

相比于政治力量的强力,经济力量的渗透如春风化雨,因其充分利用了经济规律,更容易被接受。过去往往认为共产党擅长于政治斗争不擅长经济建设,但是北海银行的发展较为充分地运用了专业人士的力量,准确地把握了货币发行规律,成功地取得了货币斗争的胜利,完成了北海币纵向、横向的深度渗透。北海银行的成功展示出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独到之处。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利用政治力量打开渗透局面,然后运用经济力量进行深度的渗透。完全依靠政治力量可能难以持续和深入,经济力量具有扎根能力、改造能力,能够嵌入既有社会结构并改造之,但是没有政治力量的保障经济力量就成为无源之水。二者有机结合就能使社会力量转化为政权的国家能力,壮大政权力量,从而使政权走向成功。

2. 与群众利益的契合。渗透实际上是将政权力量贯穿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渗透的目标对象是社会各个阶层,使其接受政权的统治并为政权政治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就难以持续和有力。如薛暮桥判断的那样,经济力量符合市场自然规律,实际上也就是符合群众的利益,^②能否符合群众利益是决定渗透广度和深度的关键要素。从开办之初的谨慎发行,到物资本位确保币值稳定,再到贷款支持贫雇农,北海银行与抗日政权一样,始终坚持人民本位,这也是确保北海币为百姓接受、信任和使用的关键。北海币代表着财富,直接涉及到群众利益,违背群众利益可能会获得短期收益(如超发、通胀),但一次机会主义行为(如伪军、顽固派所发行的各种各样的杂钞)就会损害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声誉,就会为后来的推行带来巨大障碍。

北海银行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稳定的币值和向贫雇农发放低利贷款从根本上保护和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利益,有效推动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进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个领域和社会基层。金融渗透只有与人民利益融合在一起才能顺利,扎根于人民进而融入人民,与人民一体、从人民中获取力量是北海银行成功的内在关键。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展开经济活动的基本经验,也是共产党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遵循,更是取得经济成就的关键所在。

(三)与人民融为一体的渗透是国家能力最为坚实的基础

对于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政党而言,要获得成功就要被更多的民众所认识和接受。这个过程不是自动实现的,需要多个方面的努力。相对于政治斗争和宣传,经济领域的渗透对于民众的动员更有力,但同时难度也更高,因为不仅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还需要把握经济规律,更需要与既有的利益占有者进行斗争。北海银行的实践给出了一个鲜活的通过经济渗透将政权权力成功渗透于社会的例子。

为民众带来经济利益,改善民众的经济状况是动员民众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战乱时期,币值

^①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394页;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3卷,第23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1册,第373页。

不稳是最大挑战。如前所述,抗战时期的山东更是多种货币丛生,其中多有投机性货币用以敛财。因此,提供一个具有稳定币值的货币对民众就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北海币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稳定币值为核心原则,在货币竞争中自然具有优势,不仅被百姓信任和使用,甚至也被伪军等使用。更进一步地,通过有组织的货币斗争,先后将具有掠夺性质的法币、伪币逐步排挤出根据地,更全面地保障了根据地民众的利益。同时,北海银行面向贫雇农开展低利贷款,扎根改善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直接扶助具有生产能力缺少生产资本的贫雇农开展生产,为他们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经济利益的获取使民众直观感受到了抗日政权带来的变化,正是通过北海币,使民众接触、认识到了抗日政权,也正是通过北海币的稳定币值和低利贷款进而对抗日政权产生了认同、拥护。从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出发,稳定币值的北海币成为共产党与民众之间形成的第一层具有横向覆盖性质的渗透关系,深入民众基层扶助生产的低利贷款则形成了第二层纵向扎根渗透关系。在渗透过程中,民众认识到抗日政权所具有的为人民奋斗、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进而产生对抗日政权的拥护,形成支持共产党、支持抗日政权的文化氛围和行动,完成了“渗透—认识—拥护”的逐步深化。因此,渗透能力是国家能力中最为基础的能力,是其他能力的坚强后盾。与汲取能力等相比,它是刻画国家能力高低更准确的指标。

实际上,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是成功完成“渗透—认识—拥护”的关键所在。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稳定币值也好、低利贷款也好,都是共产党与人民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制度安排,是保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有力措施。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是成功渗透的关键,不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忽视甚至损害人民利益,就不可能实现渗透,不可能为人民所接受,这样的政党和政权最终也不会成功,更难以形成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理论基于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理论分析出发点,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一致性形成国家能力的关键,^①但是该理论并没有认识到仅仅与社会中部分群体达成一致所形成的国家能力并不是最稳定的、最强大的国家能力。以财政税收为代表的汲取能力的高低,仅仅是国家能力最外在的表现,并不能反映国家能力的本质源泉所在。不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渗透,没有高质量的渗透,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汲取。共产党与人民一体的价值观和实践突破了国家能力理论的框架,揭示出了国家能力的本质源泉。

Financial Penetration and State Capacity: The History of Beihai Bank

Wei Jian

Abstract: State capacity determine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ountry, among which the ability of penetration is very critical. Without the full penetration of society, other aspects of State capacity will lose their foundation. The financial penetration process of Beihai bank in Shandong base area provides a model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ower through penetration. Beihai bank successively defeated the competitive currency with stable currency value, and became the legal tender of Shandong base area from the token currency. At the same time, it successfully took root in the social grass-roots level through loans. Radiation effect and rooting effect jointly interpret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penetration, and also provide a fresh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icro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State capacity, which fully shows that only penetration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can successfully root State capacity in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and the resulting State capacity is strong and sustainable.

Keywords: National Capabilities, Financial Penetration, Beihai Bank, Radiation Effect, Rooting Effect

(责任编辑:王小嘉)

^① 张长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国家能力理论的视角》,《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